

李钢, 谭然, 王会娟, 等.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J]. 地理科学, 2017, 37(7): 1049-1058. [Li Gang, Tan Ran, Wang Huijuan et al.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 Trafficking Crime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7): 1049-1058.] doi: 10.13249/j.cnki.sgs.2017.07.010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

李钢, 谭然, 王会娟, 颜祥, 邵琰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西北大学地表系统与灾害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基于从公益平台获取的上万条寻亲记录数据,从犯罪地理学的视角探究1980~2015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发现:① 拐卖去向以被收养为主,总量上男童多于女童,频率上低年龄段高发,可分为4个贩运类型。② 犯罪量自1980年以来呈现“倒U”型波动态势,1989~1998年为高发区间,犯罪受打击力度与人口政策影响明显。③ 犯罪量月变化呈现两个轻微倒“U”型格局,犯罪季节变化较小,夏半年高于冬半年。④ 犯罪呈现“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的“三片两线”的“场-流”空间格局特征,并有一定的带动与回流效应。⑤ 当前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集聚程度减小,而扩散程度增加,由区域性犯罪发展成全国性犯罪。最后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未来的研究作了展望。

关键词:拐卖儿童犯罪;时空特征;犯罪地理学;中国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7)07-1049-10

拐卖犯罪(主要针对妇女和儿童)是继贩卖毒品、走私军火之后位列第三的世界性犯罪现象^[1]。中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本罪所称之儿童,是指未满14周岁的男、女儿童)。中国近代拐卖犯罪活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频发,虽经公安机关多次打击,仍然十分猖獗^[2]。相较于妇女,儿童辨别、抵抗能力较弱,易受侵害。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对社会和家庭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中国各地区间的自然经济条件差异与拐卖犯罪跨区域实施的特性使得拐卖犯罪的区域性大增。区域犯罪特点、犯罪区域关联性以及犯罪区域的动态演化过程对于研究拐卖犯罪极为重要。囿于拐卖儿童犯罪的隐蔽性和分散性,犯罪总数难以估量,犯罪数据难以获得,这对犯罪研究造成困扰。目前对拐卖儿童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包括具体犯罪行为的立法^[3]、定

罪^[4]、量刑^[5]、犯罪心理^[6]以及儿童家庭结构^[7]、社会关系^[8]的分析。这些研究大多将拐卖儿童犯罪与拐卖妇女犯罪合并为拐卖人口犯罪加以讨论,从而忽视了二者的具体差异,以至于相关认识模糊不清。国际方面更多关注跨国人口贩运而忽略了国家内部人口贩运,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对于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系统研究极为缺乏,仅见Shen等^[9]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和媒体报道等二手资料对中国境内拐卖儿童犯罪的特征和原因作过理论上的间接探析,以及李钢等^[10]尝试利用1980~2012年的网络寻亲数据对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基本特征与防控对策作过初步考察。可见相关的直接数据和实证研究欠缺,因此目前国内外对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宏观特征仍缺乏基本的认知。

犯罪地理学是社会地理学的重要分支,是研究犯罪现象的空间发生、发展和分布规律的学科^[11,12]。国外犯罪地理学发展较全面,包括时空热点探索、空间分析及空间犯罪模拟等^[13~17]。国内目前正由理论介绍阶段进入实证分析阶段,时空

收稿日期:2016-09-20; **修订日期:**2016-10-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6YJAZH028)、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16C059)、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项目(HSSTP)资助。[Found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6YJAZH028), Key Grant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 of Shaanxi Province (2016C059),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alent Plan of Shaanxi Province (HSSTP).]

作者简介:李钢(1979-),男,四川成都人,副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灾害地理、社会地理与旅游地理研究。E-mail:lig@nwu.edu.cn

特征解析是目前研究的热点^[18-29]。未来建议广泛开展基于中国国情的案例实证研究,加强对犯罪地理学的理论总结提升^[30]。拐卖儿童犯罪的过程包含众多的时空信息,从而可以成为犯罪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应用地理学的视角研究犯罪,能够准确分析犯罪信息、认知犯罪的客观规律,从而帮助公安机关进行有效治理,对进一步犯罪研究与防控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以犯罪地理学为研究视角,基于从公益平台获取的犯罪数据,解析被害儿童的人口学特征及犯罪时空特征,探讨1980~2015年的犯罪扩散及区域演化特征,以期为各方寻亲和犯罪防控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资料来源

参考国内外拐卖儿童研究的先例,本文依照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31]和联合国“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议定书”——《巴勒莫议定书》^[32]将儿童年龄界定为18岁以下(0~17周岁),大致分为新生儿期(出生28d内),婴儿期(1周岁前),幼儿期(1~3周岁),学龄前期(4至六七岁),学龄期(从六七岁入小学至青春期十二三岁,相当于小学学龄),青春期(十二三岁至十七八岁,相当于中学学龄)。基本计量单位为犯罪起数,一条犯罪记录视为一起案件。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最大的公益反拐寻亲网站——“宝贝回家”,该网站在公安部完成备案,并与公安部打拐办建立合作关系。基于该网站的拐卖儿童数据库,以跨度为1980~2015年进行数据筛选,剔除掉不在该时间段内,属性为送养、遗弃、走失及离家出走的儿童信息,获得了拐卖儿童信息共14 352条,其中拐出信息(家寻宝贝)11 223条,拐入信息(宝贝寻家)3 129条。基本数据条目主要包括被拐儿童的年龄、性别、拐出地(或拐入地)、年、月等基本信息。此外,分省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33]。

基本研究区域为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考虑到行政区域的统一,对1996年以前的犯罪地点(琼、渝等)均按照现行区域进行统计,所有研究工作均按照现行行政区划开展。

1.2 研究方法

首先,参照通常的地理分区将中国划分为西南(1)、华东(2)、西北(3)、华北(4)、东北(5)、华中

(6)、华南(7)等七大地理区域,同时以3a作为一个时间单元,将1980~2015这36a分为12个时间段。其次,利用Gini-Hirschman系数测算中国拐卖犯罪的集聚程度及其变化,探求1980~2015拐卖犯罪的整体空间演化特征。最后,利用人口迁移选择指数分别测定各区域对拐卖儿童的引力值和推力值,确定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重点区域,解析犯罪流场。

1) 地理集中度指数。Gini-Hirschman系数最早由Hirschman提出,可用来衡量商品集中度和地理集中度^[34,35]。Gini-Hirschman系数能够很好的衡量区域之间不平衡的程度以及各区域对整体的贡献能力。鉴于被拐卖儿童有类似于可移动商品的特质,本文尝试借用该指数来衡量犯罪集聚程度的变化。其计算公式为:

$$G_{X_t} = 100 \sqrt{\sum_{j=1}^m (X_{jt}/X_t)^2} \quad (1)$$

$$G_{I_t} = 100 \sqrt{\sum_{j=1}^m (I_{jt}/I_t)^2} \quad (2)$$

式中, G_{X_t} 为拐出地理集中度; G_{I_t} 为拐入地理集中度; m 为区域数量; j 为各个区域; X_{jt} 和 I_{jt} 分别为第 t 个时间段内自 j 地区拐出的人口数量和第 t 个时间段内拐入 j 地区的人口数量; X_t 和 I_t 分别为第 t 个时间段内全国人口总拐出量和总拐入量。结合Gini-Hirschman系数的一般使用方法和拐卖犯罪的具体特点,得出该值越大,表示某地区人口拐出或拐入越集中,拐卖犯罪集聚程度越高。

2) 人口迁移选择指数。人口迁移选择指数(Migration Preference Index)由以色列学者罗伯托·巴奇(Roberto Bachi)于1956年提出,用于人口迁移水平的测算^[36]。本文将拐卖儿童犯罪作为人口迁移的特殊形式进行研究,选用该指数,可反映在全国拐出、拐入区域人口规模平均影响水平下,拐出区域 i 拐向拐入区域 j 的实际人口迁移数与期望数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I_{ij} = \frac{M_{ij}}{(P_i/P_t)[P_j/(P_t - P_i)] \sum_j M_{ij}} K \quad (3)$$

式中, M_{ij} 为拐出区域 i 拐向迁入区域 j 的人口数, P_i 为拐出区域 i 的人口数, P_j 为拐入区域 j 的人口数, P_t 为全区域总人口(本文为全国总人口), K 为常数,一般设为100。

由式(3)可以推知,一个区域的综合迁出选择

指数或迁入选择指数,可分别以式(4)和式(5)计算获得。

$$I_i = \frac{M_i}{(P_i/P_t) \sum_i M_i} K \quad (4)$$

$$I_j = \frac{M_j}{(P_j/P_t) \sum_j M_j} K \quad (5)$$

本文将拐卖儿童犯罪视为一种特殊的人口迁移活动,因此参考人口迁移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利用人口选择指数对中国被拐儿童区域人口迁移模式进行测算, I_i 表示区域 i 的总(综合)拐出指数, I_j 表示区域 j 的总(综合)拐入指数, M_i 为区域 i 迁向其他所有区域的拐出人口总数, M_j 为区域 j 的来自其他所有区域的拐入人口总数。如果 I_i 或 I_j 值大于100,则说明区域 i 的儿童拐出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强度或区域 j 的儿童拐入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强度。

2 分析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考虑数据可获性和与犯罪的相关性,对被拐儿童的年龄和性别结构进行统计分析(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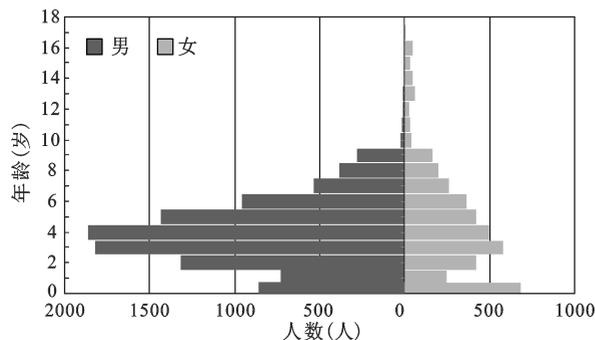


图1 拐卖儿童犯罪受害人年龄性别结构金字塔
Fig.1 Age-gender pyramid of trafficked children in China

从去向上看,中国被拐儿童主要是被收养,这与《巴勒莫议定书》^[32]定义的人口贩运的主要去向是受剥削明显不同,体现了拐卖儿童犯罪在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

从总量上看,男童10 236人,女童4 116人,被拐男童数量明显多于女童,原因在于中国部分地区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采取非法购买的方式满足对男孩的需求^[37]。

从年龄来看,被拐儿童呈现“低龄化”的特征,6岁以下被拐儿童达12 166人,占总人数的84.77%(超过4/5),其中4岁以下的被拐儿童达到8 998人,占总人数的62.7%(超过3/5),是犯罪的高发年龄段。究其原因,首先,这一阶段的儿童年龄过小,尚不具备防范意识,一旦脱离成人的监管,无法进行自我保护;其次,低龄儿童记忆有限,更容易融入拐入家庭的生活,因而成为犯罪分子的首选目标。

根据各年龄阶段被拐儿童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犯罪学特征和数量特征,可将0~17岁的被拐儿童分为“家庭操控型”、“诱骗养子型”、“复合过渡型”及“成人劳工型”4个贩运类型(表1)。

“家庭操控型”的大多家庭由于贫困或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法制观念淡薄,由父母或其他亲属主动卖出新生儿,男童数量接近,主要去向是被收养;“诱骗养子型”系拐卖儿童犯罪的核心类型,这一阶段儿童活动能力增强,开始暴露在犯罪分子的视野中,同时年龄过小导致自我防范能力不足,使得这一阶段成为犯罪的重点年龄段,占到所有案件的一半以上,犯罪分子多以诱骗的方式实施犯罪,儿童大多被收养;“复合过渡型”被拐儿童年龄适中,兼有六七岁以下及十二岁以上儿童的共同特点,过渡期特征明显,去向组成多元化,是拐卖儿童犯罪的低发阶段;“成人劳工型”被拐儿童已经初步具备成人的生理特征和劳动能

表1 被拐儿童有关特征与类型

Table 1 The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trafficked children

年龄段	性别数量	频率及可能原因	犯罪导向	贩运类型
0岁:新生儿及婴儿期	男童略多于女童	高发期:儿童无任何自救与反抗能力	拐卖(自卖)导向:养子	家庭操控型
1~6岁:幼儿及学龄前期	男童远多于女童	高发期:外出机会多、记忆能力弱、识别能力差	拐卖导向:养子、乞儿	诱骗养子型
7~12岁:学龄期	男童远多于女童	低发期:记忆能力强、识别能力强	拐卖导向:养子、家佣、童工	复合过渡型
13~17岁:青春期	女童远多于男童	低发期:记忆能力强、识别能力强	拐卖导向:童养媳、家佣、童工、性剥削、人体器官交易、盗抢工具	成人劳工型

力,这一阶段被拐女童被视为妇女,多被强迫结婚或从事色情服务,男童则成为家佣、非法劳工及偷盗、抢劫工具等。

2.2 时间变化特征

1) 年际变化。统计各年案件数代表年犯罪量,探讨1980~2015年被拐男、女童及总犯罪量的年变化特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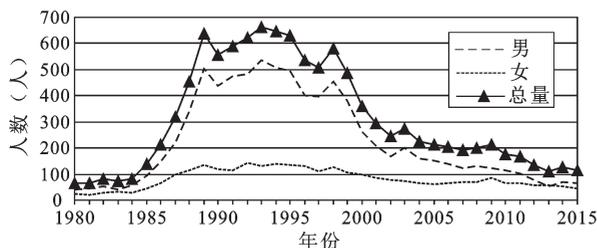


图2 1980~2015年拐卖儿童犯罪量统计

Fig.2 Numbers of trafficked children in 1980-2015

总体上看,犯罪总量与占被拐大多数的男童被拐犯罪量变化趋势极为同步,1980年以来大体呈现“倒U”型波动态势,并可以进一步细化出6个变化阶段:Ⅰ平稳增长期(1980~1984)、Ⅱ快速增长期(1985~1989)、Ⅲ波动下降期(1990~2001)、Ⅳ平稳下降期(2002~2006)、Ⅴ轻微增长期(2007~2009)、Ⅵ平稳下降期(2010~2015)。各阶段案发数与同期公安部门的打击措施与力度(区域性还是全国性打击及其效力的高低)呈现“跷跷板”式的响应变化。此外,波动态势也与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时空非均衡性呈现一定响应,紧缩与宽松的人口政策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序的实施情况不同,可能是区域间拐出推力和拐入拉力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中国拐卖儿童犯罪在经历了1989~1998年的高发区间后呈现降低发态势,当下儿童安全环境较以前已有较大改善。

2) 年内变化。统计拐卖儿童犯罪记录中的月份数据,得到被拐卖人数随月份的变化特征(图3)。整体上看,从当年2月到次年1月,案件数呈现两个轻微倒“U”型格局,第一个倒“U”峰值出现在5~8月,这一阶段随着天气转暖,孩童外出活动增加,案发数逐渐上升;而第二个倒“U”峰值出现在10月和1月,推测与人口流动性增强及犯罪分子实施“过年前最后一搏”有关。

犯罪季节变化较小,四季分布较为平均,夏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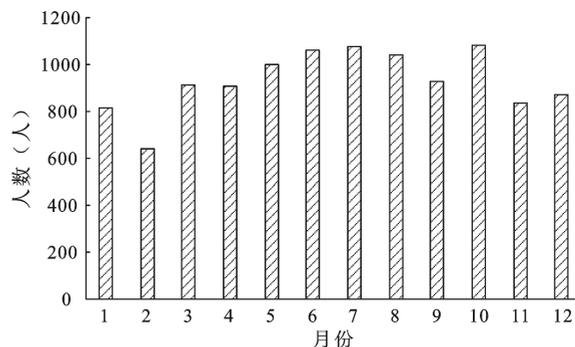


图3 1980~2015年拐卖儿童犯罪月份变化

Fig.3 Monthly variation of child trafficking crime in 1980-2015

年(夏秋,54%)比冬半年(冬春,46%)犯罪比率高出8%。推测亦与夏半年温度条件和空气质量较好,伴随孩童外出机会增多,犯罪机会也增多有关。可见,气温回升对犯罪发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3 空间变化特征

1) 空间分布。利用 ArcGIS 软件将1980~2015年拐卖儿童犯罪案件总数按照自然断裂点分为低、中低、中高、高4个等级,进而绘制其空间分布图。根据其年际变化特点(图2),选取1989、1998、2009年3个不同阶段的峰值年份进行截面分析,重点考察犯罪量随时间变化的阶段性趋势。

结合图4、5可以看出:对比1989和1998年,拐出中心主要位于四川和贵州,拐出中高发地区出现南北分化;拐入中心由福建和华北变为福建、广东与河南,拐入中高发区在东部逐步连片。对比1998年和2009年,拐出中心由云贵川拓展到广东河南,拐出中高发地区向中东部蔓延;拐入中心由福建、广东一分为二:南部在福建,北部在山东。

从拐出拐入总图(图6)来看,西南及中部地区是中国拐卖儿童主要的流出地,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拐卖儿童主要的流入地;四川、贵州为主要的儿童拐出高发地,福建、河南、河北为主要的儿童拐入高发地;河南、广东是儿童拐出拐入双向高发地。

2) 指数测算。鉴于被拐儿童有类似于可移动商品的特质,并且可将拐卖儿童犯罪视为一种特殊的人口迁移活动,引入地理集中度指数和人口迁移选择指数,进一步考察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分布及其集中程度的变化趋势。

(1) 地理集中度指数。将1980~2015年这36 a划分为12个时间段计算各自拐出拐入地理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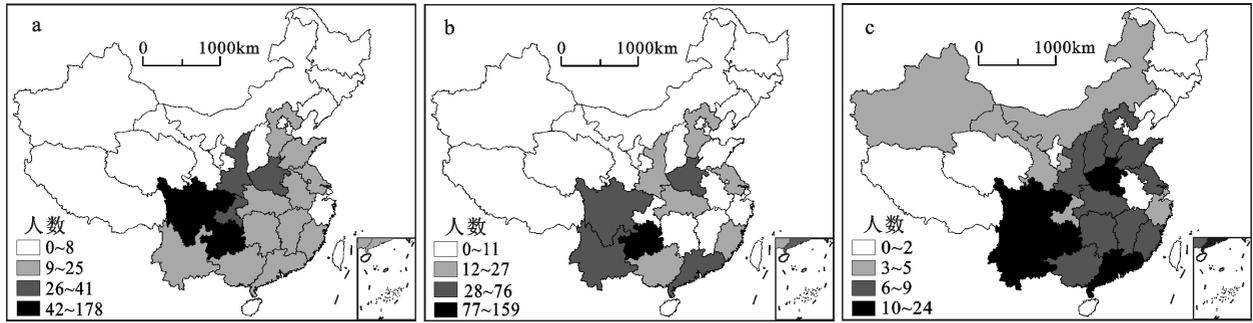


图4 1989(a)、1998(b)、2009(c)3个高发年份全国拐出格局

Fig.4 Supply patterns of the three highly occurring years:1989 (a), 1998 (b), 2009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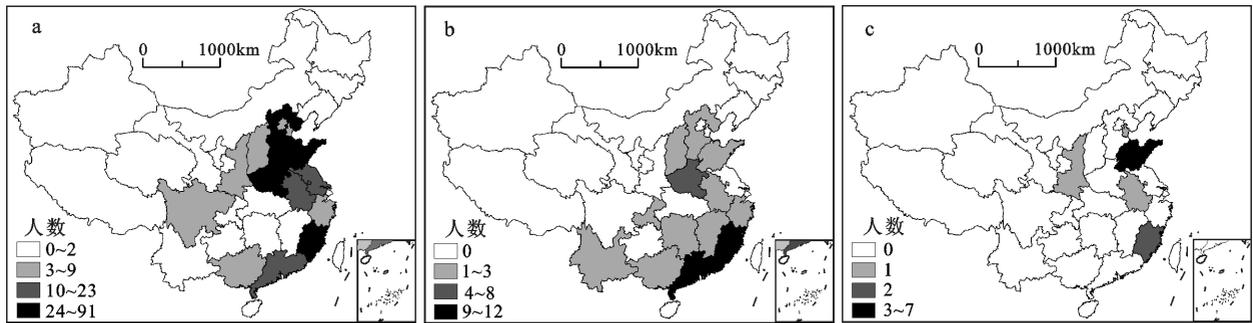


图5 1989(a)、1998(b)、2009(c)3个高发年份全国拐入格局

Fig.5 Demand patterns of the three highly occurring years:1989 (a), 1998 (b), 2009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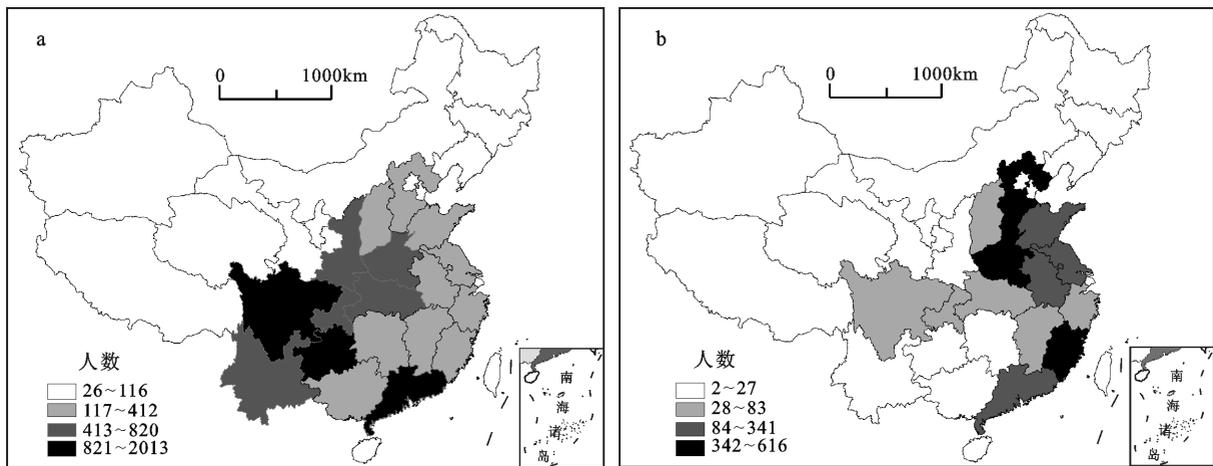


图6 1980~2015年拐出总图(a)和拐入总图(b)

Fig.6 Total supply (a) and demand (b) patterns in 1980-2015

中度指数(Gini-Hirschman 系数,因“宝贝寻家”需要被拐者主动寻亲,且被拐者自身被拐身份确定时间通常较长,因此距今较近的2000年以后的数据偏少,使得2000~2015的拐入数值空缺),得到36 a地理集中度变化趋势(图7)。

中国儿童拐出地区集中度(虚线)在1980年代不断上升,表明1980年代犯罪集聚程度的不断加

强,犯罪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犯罪区域性特征明显。进入1990年代,拐出集中度不断下降,表明犯罪扩散程度不断加强,华北、华中、东部地区拐卖犯罪的案发率与西南地区案发率的差距不断缩小。拐卖犯罪的发生逐步由西南地区扩散至全国各地,由区域性犯罪问题向全国性的犯罪问题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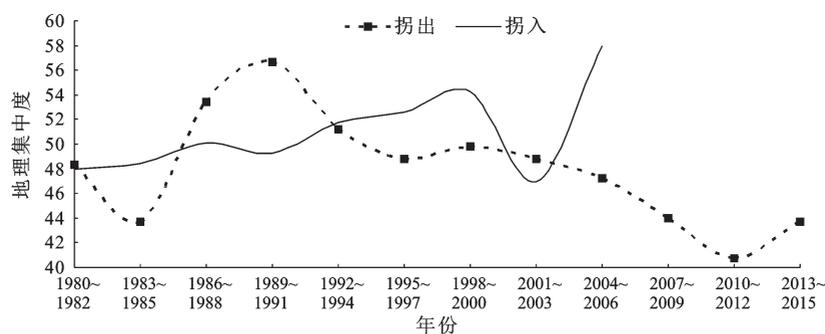


图7 1980~2015地理集中度指数变化趋势

Fig.7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1980-2015

(2) 人口迁移选择指数。经过计算,得到中国七大地理区域的迁(拐)出、迁(拐)入指数(2015年人口统计数据未公布,因此2013~2015年数据空缺),进而生成人口迁移指数趋势图(图8)。从指数数值来看,拐出指数差异较大,西南地区的6个时间段指数值均高于200,而其他区域在所有的时间段中基本上拐出指数值都位于150以下。各区域拐入指数数值较小,均位于200以下,且各区域差异较小。从指数的波动特征来看,拐出指数相对稳定,其中,2、3、4、6、7区指数较为平缓,1区和5区在1986~1994年呈现剧烈变动,这与1990年前后案发数的激烈变化相吻合;拐入指数整体变化剧烈,7区域均呈现数值不稳定的特征,证明前述拐出地和拐入地分布均一度差异较大的特征。

参考人口迁移选择指数相关研究先例和本研究的现实基础,按照总时段和单个时段拐出、拐入指数平均值及时段值,划分各级拐出中心和拐入中心(表2)。

(3) 主犯罪空间格局。综合上述,全国拐卖儿童犯罪主空间“场-流”格局为“三片两线”(图9):从云贵川拐出到闽粤和冀鲁豫地区(三大犯罪场),因而形成南北两条线路(两向犯罪流),南线从云贵川经过广西抵达广东、福建一带,重点区域为广东潮汕地区以及福建沿海地区(泉州、莆田等),其中南线经过广西(玉林、南宁等)形成一定附带流;北线从云贵川经过陕西抵达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地带(新乡、安阳、邯郸、邢台、衡水、德州、菏泽等),其中北线经过陕西南部(汉中、安康、商洛)形成一定的附带流。另外,在广东和河南两省存在不同程度的“回流”效应,即拐出和拐入在两省均较为频发。总体来看,中国拐卖儿童犯罪区域分布上呈现“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

的宏观特征。

3 结论与研究展望

3.1 结论

本研究基于公益网站数据,基于统计分析和ArcGIS空间分析,构建地理集中度指数和人口迁移选择指数,对1980~2015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人口学特征以及时空分布、演化与集聚特征进行分析,旨在揭示其基本规律。综合上述分析,得到如下初步结论:

1) 中国被拐儿童主要是被收养,这与《巴勒莫议定书》定义的人口贩运的主要去向是受剥削不尽相同,体现了拐卖儿童在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总量上男童多于女童,频率上低年龄段高发,年龄上青春期阶段女童多,新生儿、婴儿期,幼儿及学龄前期和学龄期阶段男童多,各年龄段由低到高可依次分为“家庭操控型”、“诱骗养子型”、“复合过渡型”及“成人劳工型”4个贩运类型。

2)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量自1980年以来大体呈现“倒U”型波动态势,在1989~1998年峰值区间。犯罪受打击力度与人口政策影响明显,案发数与公安部门的打击力度呈现“跷跷板”式的响应变化,与中国人口政策松紧调整的时空非均衡性存在一定响应。

3)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案件数逐月变化呈现两个轻微倒“U”型格局,峰值分别在5~8月和10月、下一年1月;犯罪季节变化较小,夏半年(夏秋)高于冬半年(冬春),气温回升对犯罪发生有促进作用。

4)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呈现“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的“三片两线”的“场-流”空间格局,三大犯罪场之间形成两向犯罪流,并有一定的带动与回流效应:从云贵川拐出到闽粤和冀鲁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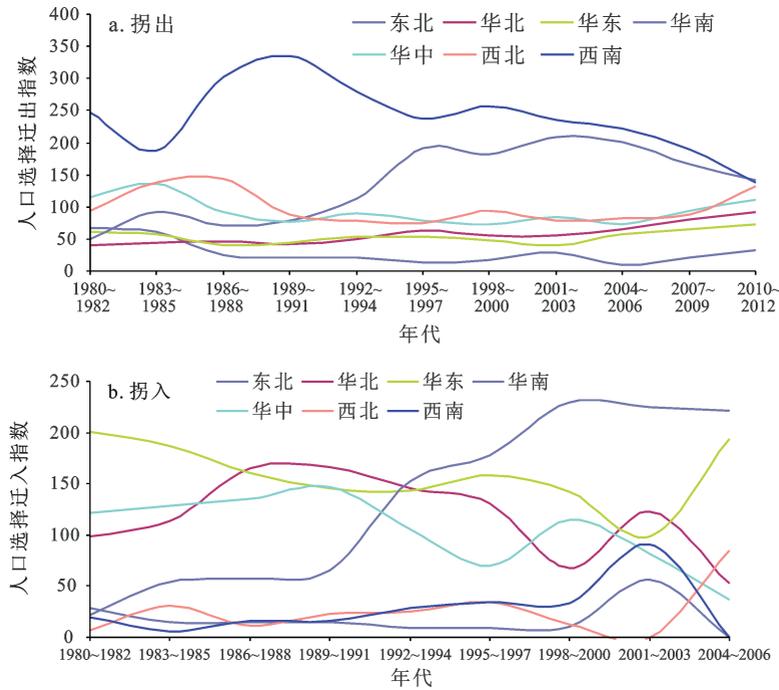


图8 七大区域人口选择迁移指数变化(a.迁出)、迁入指数(b.迁入)

Fig.8 Migration preference index of seven regions (a.supply; b.demand)

表2 拐出拐入中心划分标准及对应区域

Table 2 The division criteria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gions

类型	划分标准	区域
强势拐出中心	总时段拐出指数平均值大于200, 拐出侧至少6个时段大于200, 拐入指数小于100	西南
中高拐出中心	总时段拐出指数平均值大于100小于200, 拐出侧至少6个时段大于100, 拐入指数小于100	无
强势拐入中心	总时段拐入指数平均值大于200, 拐入侧至少5个时段大于200, 拐出指数小于100	无
中高拐入中心	总时段拐入指数平均值大于100小于200, 拐入侧至少5个时段大于100, 拐出指数小于100	华中、华北、华东
两高中心	总时段拐出指数和拐入指数平均值均大于100, 且拐出侧至少6个时段拐入侧至少5个时段大于	华南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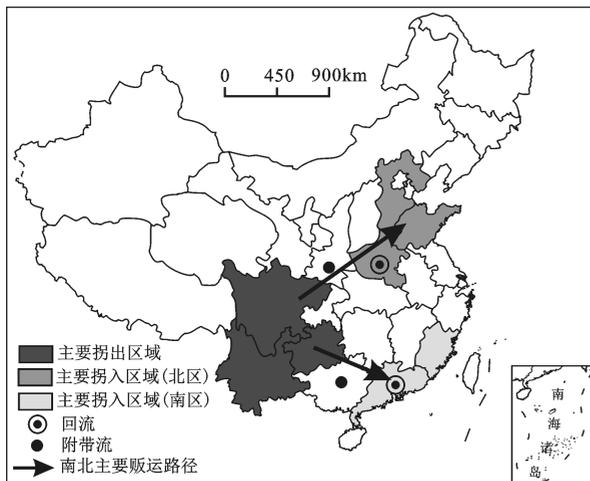


图9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主要空间“场-流”格局

Fig.9 The total spatial pattern of child trafficking crime in China

地区形成南北两条线路,北线经过陕西、南线经过广西形成一定的附带流,广东和河南两省则明显存在回流;这与东西部经济基础差异导致的“推-拉”作用有关。

5)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集聚程度减小,而扩散程度增加,逐步由区域性的犯罪发展成全国性的犯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存在大量“留守儿童”的“空心村”和存在大量“流动儿童”的“城中村”是潜在高发区,这对未来的防控是一大挑战。

3.2 研究展望

由于本文主要采用的是网络开放数据,具有一定的不完整性和随机性,例如西部的青海、西藏和东北地区数据偏少,这是犯罪发生少还是上网

记录少都有待进一步探讨。此外,采用的时空尺度和精度也有待提高,因此认识总体上较为宏观和粗浅。未来进一步开展的工作:

1) 困于拐卖儿童犯罪的隐蔽性和分散性,研究数据获取难度大,相关研究严重不足,亟需寻找整合新的研究视角和可靠资料开展基础性研究工作。

2)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基本特征和发生规律缺乏基本的认知,犯罪的演变历史,城乡、家庭与人口学特征、时间特征、空间特征、犯罪路径网络特征等有待深入研究和揭示。

3)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发生原因和机制有待解析,城市化的非均衡快速发展及以往人口政策的时空非均衡性实施与调整对犯罪演变的影响有待考察,新近及未来法规政策的出台和调整如“买方入刑”和“开放二胎”等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演变趋势和影响也有待评估。

4)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国情渊源与独特性有待探究,跨境贩运研究缺乏,中外拐卖儿童犯罪的比较研究有待开展,相互参考借鉴意义有待发掘。

5) 拐卖犯罪对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及时空社会网络影响有待评估,其成功返乡之后的家庭与社会融入和后期人文关怀等有待考察和推进,相关对策建议有待提出。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蒋慧. 广西地区打击跨境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调研报告[D].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12. [Jiang Hui.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combating cross-border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crimes of Guangxi region. Nanning: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2012.]
- [2] 莫传明. 刑事视野下的拐卖儿童犯罪分析[J]. 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11,(5):164. [Mo Chuanming. Child trafficking crime analysis from a penal perspective. Legal System and Economics (middle Xunkan), 2011,(5): 164.]
- [3] 甘莉. 我国刑法中拐卖人口犯罪的立法建议[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35(1):118-120. [Gan Li.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on human trafficking crime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4, 35(1): 118-120.]
- [4] 赵长青. 再论拐卖人口犯罪的构成理论与罪名[J]. 现代法学, 1992,(1):11-16. [Zhao Changqing. Re-discussing on constitution theory and charges of human trafficking crime. Modern Law Science, 1992,(1):11-16.]
- [5] 陈国庆,韩耀元,宋丹.《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解读[J]. 人民检察,2010,(9):33-37. [Chen Guoqing, Han

- Yaoyuan, Song Dan. Interpretation of “on punishing the 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children”. People’s Procuratorate, 2010, (9): 33-37.]
- [6] 高晓莹. 拐卖儿童罪之犯罪学探析[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6):90-94. [Gao Xiaoying. Criminology exploration of child trafficking crimes. China Youth College for Political Sciences, 2010,(6): 90-94.]
- [7] 王金玲. 华东五省云南/广西籍未成年被拐卖/骗妇女/儿童流入地个案研究[J]. 浙江学刊,2005,(4):200-215. [Wang Jinling. Case studies of trafficking-in areas of trafficked women and children in five provinces of East China, Yunnan and Guangxi.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005,(4): 200-215.]
- [8] 王金玲. 质性研究中情景脉络的理解和诠释——以对山东省云南籍被拐卖/骗婚迁入妇女的研究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19-23. [Wang Jinling.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ene in the context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xamples of trafficked women’s inflows in Shandong and Yunnan province. Yunnan University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6,(6): 19-23.]
- [9] Shen A, G A Antonopoulos, G Papanicolaou. China’s stolen children: internal child traffick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Trends in Organized Crime, 2013,(16):31-48.
- [10] 李钢,颜祥,王会娟. 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基本特征与防控对策[J].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 2015,(5):65-79. [Li Gang, Yan Xiang, Wang Huijuan. The basic features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trafficking in children in China. Internal Contributions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 2015,(5):65-79.]
- [11] Peet R. The geography of crime: A political critique[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75, 27(3): 277-280.
- [12] 祝晓光. 论犯罪地理学[J]. 人文地理, 1989,4(2): 40-46. [Zhu Xiaoguang. A discussion on the geography of crime. Human Geography, 1989, 4(2): 40-46.]
- [13] Olligschlaeger A M.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d crime mapping[M]// Weisburd D, McEwen T. Crime Mapping and Crime Prevention. Monsey: Criminal Justice Press, 1997:313-347.
- [14] Wang F 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Crime Analysis[M]. London: Idea Group Publishing, 2005.
- [15] Liu L, Eck J. Artificial crime analysis systems: using computer simulation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M]. New York: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2008.
- [16] Johnson S D, Lab S P, Bowers K J. Stable and fluid hotspots of crime: differentiation and identification[J]. Built Environment, 2008,34(1): 32-45.
- [17] LeBeau J L, Leitner M. Introduction: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y of crime[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11, 63(2): 161-173.
- [18] 孙峰华, 魏晓. 犯罪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J]. 人文地理, 2004, 19(5): 60-63. [Sun Fenghua, Wei Xiao. New advance of study on criminal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004, 19(5):60-63.]
- [19] 毛媛媛, 戴慎志, 沈志联. 国内城市空间环境与犯罪关系研究评析[J]. 人文地理, 2010, 25(3): 41-46. [Mao Yuanyuan, Dai

- Shenzi, Shen Zhilian. A review of studie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crime in China. *Human Geography*, 2010,25(3): 41-46.]
- [20] 王发曾. 我国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研究二十年[J]. 人文地理, 2010,25(4):25-30. [Wang Fazeng. A review of urban spatial anti-crime study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00. *Human Geography*, 2010,25(4): 25-30.]
- [21] 严小兵,焦华富. 犯罪地理国际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31(10):1390-1398. [Yan Xiaobing, Jiao Huaifu. A review on the foreign criminal geography research. *Progress in Geography*,2012,31(10): 1390-1398.]
- [22] 刘大千,修春亮. 国内外犯罪地理学研究进展评析[J]. 人文地理,2012,27(2):38-44.[Liu Daqian, Xiu Chunliang.Review of progress in crime geograph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Human Geography*,27(2):38-44.]
- [23] 冯健,黄琳珊,董颖,等. 城市犯罪时空特征与机制——以北京城八区财产类犯罪为例[J]. 地理学报,2012, 67(12):1645-1656. [Feng Jian, Huang Linshan, Dong Ying et al.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urban crimes-property crime in eight districts of Beijing as an exampl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12, 67(12): 1645-1656.]
- [24] 陆娟,汤国安,张宏,等. 犯罪热点时空分布研究方法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2012, 31(4):419-425.[Lu Juan, Tang Guo'an, Zhang Hong et al. Review of research methods of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rime hot spot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31(4): 419-425.]
- [25] 刘大千,修春亮,于嘉. 长春市财产犯罪的空间分析[J]. 地理科学,2012,32(4):477-484.[Liu Daqian, Xiu Chunliang, Yu Jia. Spatial analysis of property crimes in Changchu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32(4):477-484.]
- [26] 严小兵. 中国省域刑事犯罪率的时空演变及机制研究[J]. 地理科学,2013, 33(5):529-537. [Yan Xiaobing.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criminal rate of Chinese province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33(5): 529-537.]
- [27] 刘大千,宋伟,修春亮. 长春市“两抢两盗”犯罪的空间分析[J]. 地理科学,2014, 34(11):1344-1352. [Liu Daqian, Song Wei, Xiu Chunliang. Spatial analysis of “Two robbery and Two theft” crime in Changchu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11): 1344-1352.]
- [28] 徐冲,柳林,周素红. 基于临近相似性考虑的犯罪热点密度图预测准确性比较——以DP半岛街头抢劫犯罪为例[J]. 地理科学,2016,36(1):55-62.[Xu Chong, Liu Lin, Zhou Suhong. The comparison of predictive accuracy of crime hotspot density maps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near similarity:A case study of robberies at DP peninsul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36(1):55-62.]
- [29] 单勇.城市中心区犯罪热点制图与防卫空间设计[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4(2):87-99+174. [Shan Yong. Crime hot spot mapping and defense space design in city center.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of Jilin University*, 2014,54(2): 87-99 + 174.]
- [30] 姜超,唐焕丽,柳林. 中国犯罪地理研究述评[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33(4):561-573. [Jiang Chao, Tang Huanli, Liu Lin. Review of crime geography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2014, 33(4):561-573.]
- [31]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R]. 1989, Treaty Series 1577 (November): 3.
- [32] U N General Assembly.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J/OL].2000-11-15.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720706c0.html>.
-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5)[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2015).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2015.]
- [34] 刘靖,毛学峰,辛贤. 中国农产品出口地理结构的衡量与分析[J]. 世界经济,2006,(1):40-49+96. [Liu Jing,Mao Xuefeng,Xin Xian.The measure and analysi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xport from geographic perspective.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06,(1):40-49+96.]
- [35] 鲁奇,张超阳,段娟. 1965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及其地域格局的演变态势[J]. 地理研究,2007,26(6):1247-1254. [Lu Qi, Zhang Chaoyang,Duan Juan.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of its regional distribution change(1965-2005). *Geographical Research*,2007,26(6):1247-1254.]
- [36] 李薇. 我国人口省际迁移空间模式分析[J]. 人口研究,2008,32(4):86-96. [Li Wei.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China.Population Research,2008, 32(4):86-96.]
- [37] 孙桂峰. 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思考[J]. 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6):49-51. [Sun Guifeng. Reflections on of trafficking crime in women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Hubei Public Security College*, 2000,(6): 49-51.]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 Trafficking Crime in China

Li Gang, Tan Ran, Wang Huijuan, Yan Xiang, Shao Yan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Institute of Earth Surface System and Hazard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over ten thousand pieces of relative-seeking data from a certain online public platform, the basic laws of crime activities of trafficking in children in China during 1980-2015 were examined through a variety of analytical methods like GIS and SP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of crime. It was found that: 1) The main purpose of trafficking is for forced adoption, and the total trafficking amount of the male is more than that of the female. High trafficking frequency occurred at low ages. The female were trafficked more at adolescence stages while boys were trafficked more at baby, infant and children stage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rafficking types: “family control type”, “adoption tricking type”, “integrated transition type” and “pre-adult labor type”. 2) The amount of crime since 1980 presented a “Pour Spoon” pattern of fluctuations and reached the peak stage during 1989-1998. The crime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strike policy and population policy with a “seesaw” type of response. Compared to promulgation of legal foul, a direct blow from th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was still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curb. 3) The number of monthly changes in criminal cases showed two-inverted “U” pattern, with two peak stages from May to August and from October to January. Seasonal variation was not obvious. The crime occurred more frequently during the winter half-year (summer and autumn) than the winter half-year (winter and spring), which indicated temperatures could promote the occurrence of the crime. 4) The crime presented “centralized supply/trafficking-out from the west while decentralized demand/trafficking-in to the east” features: the core area of supply concentrated in Sichuan and Guizhou of Southwest China while the core area of demand concentrated in Fujian, Guangdong, Shandong and Henan. The whole migration pattern of “trafficking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had a linkage to the “push-pull” mechanism resulting from the regional economic differenc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areas. 5) The crime presented the main “field-flow” feature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as “three-area and two-route” and the two crime flows were formed between the three crime areas with certain driving effect: the south route’s flow was from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to Fujian with a certain collateral flow in Guangxi, and the north route’s flow was from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to Shandong, Henan and Hebei with a certain collateral flow in Shaanxi. 6) With the time went on,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the crime of trafficking in children presented a descending trend. Gradually in future, the crime was sure to be developed from a regional crime to a national crime, and “Hollow Village” and “Urban Village” would be the potential high-risk areas, which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for futu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everal research pro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ata, contents, theories, methods and comparison are figured out.

Key words: child traffick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geography of crime; China